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实践路径

刘转青¹, 贺启令², 夏建超³, 潘江洁⁴

(1.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2. 贵州中医药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3. 常德市特殊教育学校, 湖南 常德 415000; 4. 关岭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贵州 安顺 561399)

摘要:探寻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是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亦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运用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历史进行考察,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有助于凝聚民族精神,筑牢共同体意识;凝练特色,实现体旅融合;凝心聚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夯实文化基础,筑牢精神内核,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其治理价值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各阶段经济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现实需求。在这一过程中,需找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加强政策支持与制度配套,健全民俗体育村落自治组织,形成文化自觉并增强文化认同,注重以点带面塑造典范,从而以民俗体育活动为纽带唤起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

关键词:民俗体育;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振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宏伟蓝图(万义等,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中央要求,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急剧加速,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价值观念快速变迁,人际关系范式得以重塑,乡村治理问题变得尤为错综棘手。尽管各级政府部门为改善乡村治理效果、实现乡村振兴新进行了诸多尝试和探索,乡村治理模式有了一定创新,局面有了一定改观,但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疏离、凝聚力减弱、整合力下降等核心问题远未得以解决。民俗体育作为一种植根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因其在促进人际交往、维系乡土情感、增强凝聚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且具备深厚的群众根基,而逐步受到关注,被推荐引入到乡村治理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因此,新时期,需重新审视民俗体育的社会治理功能,深入挖掘其治理价值,发挥其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在深入阐释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之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能更好地挖掘民俗体育的乡村治理价值,助推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1 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民俗体育助力的价值意蕴

1.1 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根据乡村社会发展特征,遵循乡村发展内在规律,通过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构架新的治理格局、创新治理模式、完善治理机制、激发治理动力,以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质量,增强治理效果,促进乡村振兴,更好地满足乡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主要特征包括:在发展目标上,旨在提升乡村治理质量,实现乡村善治,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发展模式上,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创新,通过治理格局重塑、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方式手段创新来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质量;在发展动力上,通过优化、整合、赋权、增能等方式激发各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

收稿日期:2023-08-04; 修订日期:2023-11-20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1GZZD49)。

第一作者简介:刘转青(1980-),男,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治理、民族传统体育,E-mail:lzqly99@126.com。

1.2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1.2.1 凝聚民族精神,筑牢共同体意识

诸多民俗体育项目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素,承载着重要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凝心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中华武术中蕴含着的“和谐、包容、礼让”、龙舟竞渡中蕴藏着的“团结、协作、拼搏、进取”、舞龙舞狮中蕴含着的“幸福、和谐、安康”等文化因素,通过文化传播、文化凝练,最终形成“团结、互助、进取、拼搏、和谐、安康”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繁荣、粉碎西方帝国主义分化和渗透的现实需要,是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精神根基(张静,202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在此聚焦。因此,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发掘民俗体育中的共同体元素,从中提炼民族团结、民族交融等共同体智慧,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和形象,有利于逐步推动民族团结工作的开展,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1.2.2 凝练特色,实现体旅融合

经济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可见,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提高村民收入,夯实乡村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

受到地理、交通、政策、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很难得到资本的关注,经济发展很难采用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发展模式。因此,乡村经济的发展只能立足于乡村社会实际,充分挖掘、利用乡土社会的各种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乡村社会最大的资源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两类资源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多次提出要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打造自身IP,实现产业转化。民俗体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术等民俗体育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瑰宝。毋庸置疑,民俗体育可以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经济价值,助力乡村振兴。类似于其他传统文化,民俗体育主要通过一些节庆活动以及与地方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在各类节庆活动的组织开展过程中,可以加大民俗体育活动的展演力度,赋予民俗体育项

目更多的呈现空间,以增强民俗节庆活动自身的魅力,扩大影响力,进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如贵州省台江县近年来逐步将当地的民俗体育项目“舞龙嘘花”“斗牛”等引入到大型节庆活动“姊妹节”当中。民俗体育的引入使“姊妹节”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增强了节庆活动的独特魅力,使参与规模逐步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地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民俗体育还可以与地方旅游实现深度融合,为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凝练形成新的旅游业态,不断赋能地方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1.2.3 凝心聚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民俗体育伴生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呈现出参与度高、参与面广、自发性强等特征。由于民俗体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承载着特定区域居民共同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追求,且世代为村民所传习,故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约束力,可以在凝聚民心、化解邻里矛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诸多民俗体育活动均聚集于某一特定区域,以村寨为基本参与单位组织开展,期间通常伴随有较为隆重的仪式性活动,其民族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仪式性特征均较为明显。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民众打破现代社会所设立的“区隔”,搁置自己原有的身份角色,回归于同一平台,以“村民”这一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展开合作,从而实现“身体共在”,构建出各民族成员身体共在的仪式场域。在这个仪式化场域中,村民遵循共同的习俗、规范,以具体的民俗体育项目为载体,彼此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特定的互动仪式能够使村民不断地回忆某物、再现某物,进而以其象征性和隐喻性向人们的头脑和记忆中反复灌输某物的象征意义(袁佩媛等,2023),这是催生“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赵超等,2018)。通过这种反复的再现、强化,可以不断丰富村民的情感体验,引发情感共鸣,积聚情感能量。在此基础上,可以帮助村民个体不断凝聚团结感和内聚力。团结感和内聚力一旦形成,个体将会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和身份感,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认同转变,获取身份认同,树立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自觉地维护共同体的荣誉。这正是乡村社会凝心聚力的重要内容,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其次,滋生于乡土社会的民俗体育活动中蕴含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重要道德品质,诸多民俗体育文化中均蕴含着人们祈求平安、和谐、幸福的价值理念,传递着和谐、团结、协作、互助等重要价值诉求,这些道德品质与乡村治理提出的德治相契合,能够为乡村德治的赓续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王世军,2022)。夯实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再次,每一项民俗体育项目均有特定的规则体系和规范要求,这是民俗体育开展的重要前提。这些规范要求约定俗成,为村民所共同遵循,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化解村民矛盾、解决村民纠纷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进而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可见,伴随着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某些规范性的民约村规得以形成并为村民长期共同遵循,在乡土社会中发挥出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有利于乡村秩序的维护,可以成为当代乡村治理制度建设的有益补充。当前,我国高度重视乡村法规制度建设,乡村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但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制度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并可适时引入一些适用性强的村规民约,以不断补充完善现有的制度体系(杨俊一等,2015)。因此,可以通过将民俗体育活动中的一些合理的、适用性强的规范纳入乡村治理制度建设范畴之中,不断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1.2.4 夯实文化基础,筑牢精神内核,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之于国家,有如灵魂之于肉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精神的内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独立自主的依托(刘转青等,2011)。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当坚守自己的文化,倘若丧失了自身所固有的文化,则等同于失去了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必将无法自强于世界。五千多年华夏文明所孕育滋养的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是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部分内容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必须以既有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刘转青等,20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天下情怀之中(辛鸣,2014),实现中国梦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加强对各类民俗体育项目的搜集整理,深入挖掘当中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因子,凝练其中的文化精华,将其有针对性地纳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系,能够对现有文化体系的有益补充,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核,增强文化底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基础。

2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历史考察

通过梳理文献,并对部分民俗体育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民俗体育以其自身的功能价值为基本前提,以乡村社

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出不同的功能,从不同层面助推乡村社会发展,具体体现在维系村民情感、增强村寨凝聚力、规范村民行为、维护乡土秩序、抵御外敌、保护村寨安宁、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助力乡风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本文以安顺鲍家拳的价值变迁为例,对此进行阐述。

2.1 个案选取——安顺鲍家拳

安顺鲍家拳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古老的拳术之一,在安顺鲍家屯广为传播,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是鲍家屯特有的军旅文化遗产(夏建超,2023)。鲍家屯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位于安顺市东南部,距安顺市区约23公里、距贵阳市约65公里,村域面积约5平方公里,目前全村共有724户、2540人。鲍家屯始建于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被誉为“大明屯堡第一屯”,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2010年7月,鲍家屯村入选为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12月,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据相关文献记载以及传承人口述,鲍家拳由鲍姓二世祖鲍叔牙(生于公元前728年,卒于公元前644年)所创,于大明洪武二年由入黔始祖鲍福宝在“调北征南”的过程中传到贵州安顺地区,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现在贵州安顺鲍家屯已传至第二十三代子孙。据《鲍氏家乘》(图1)记载:“溯吾鼻祖福宝公只来黔,乃大明洪武调北征南之时也。原籍江南,寄籍黔南,卜居永安。”《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中记载:“鲍姓,原籍江南徽州府歙县新安卫塘樾村太和舍。洪武二年始迁。祖鲍福宝,因‘调北征南’入黔,封振威将军。卜居安顺永安屯,即今鲍家屯。”600多年以来,鲍家拳在鲍家屯以及周边村寨的社会治理中发挥出非常重要的功能价值。



图1 《鲍氏家乘》卷玖

Figure 1. "The Historical Book of Bao Family" Volume IX

2.2 研究方法及实施过程

课题组于2022年7—8月、2022年12月、2023年2月3次前往鲍家屯村进行田野考察。考察期间,课题组成员居

住在屯堡文化宣传员鲍中权家中。在逐步熟悉当地民风、习俗,并对鲍家拳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为更真实地追溯安顺鲍家拳的发展历程及其价值变迁,采取无结构访谈、口述、参与式观察等形式展开田野调查。无结构访谈和口述对象主要为安顺鲍家拳传承人、鲍家屯文化宣传员、村干部、鲍家拳习练者。以文字记录与手机录音相结合的方式记录了受访者的口述回忆,主要涉及安顺鲍家拳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历程、历史文化背景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内容。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结合查阅的地方历史文献,为论文撰写奠定基础。此外,课题组部分成员还亲自参与到安顺鲍家拳的操练和展演当中,通过参与式观察体验和感受真实场景,与受访者近距离交流互动,更真切地了解习练者和展演者的个人情感、实践行为、主观态度、个性心理及文化背景等内容,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2.3 安顺鲍家拳的价值变迁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诞生伊始,鲍家拳便在安顺屯堡的社会治理中发挥出重要功能。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同,安顺鲍家拳发挥出的社会治理价值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明朝时期,鲍家屯所处的西南地区战事频繁。在当时的军屯制度下,作为移民的鲍屯人既要响应明朝政府的征召,频繁参与战事,还需应对周边部族的威胁。鲍家屯的负责人利用鲍家拳技击性强、攻防兼备的特点进行军事训练,以达到强健士兵体魄、磨练士兵意志、增强士兵战斗力之效。彼时,安顺鲍家拳在强健体魄、严格军纪、整顿军风、增强凝聚力、夯实战斗力等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价值,进而在协助明朝政府平息战乱、抵御外敌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这是其军事价值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由于鲍家屯对鲍家拳的传承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明确规定只有本屯人才能习练鲍家拳。因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鲍家拳逐步成为鲍屯人的族群文化象征,用以区分“你”“我”,形塑了村落族群的空间边界(吴莲花,2022)。这种集体的社会身份认同通常包含不同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以及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与“他们”之间进行的明显区分(维克多·特纳,2006),用以划分“我族”与“他族”。尽管没有公开地使用族群标签,但在鲍屯人的思想意识中,鲍家拳是鲍家屯的文化象征,汇聚了族人的集体记忆。习练鲍家拳被视为鲍屯人的一种独特身份标识,表明其与鲍家世祖一脉相承的血缘身份认同。笔者在访谈过程中也印证了早期这种空间边界的存在。

以前,外姓人是不允许习练鲍家拳的,更不允许鲍家人私自向外姓人传授鲍家拳,如果有人触犯这条规矩,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这条规矩自鲍家拳创立以来就已经立下,大家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鲍姓家族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建立鲍家屯之后,这条规矩更是被多次强调。

(访谈:BX,男,安顺鲍家拳第二十三代传承人)

清朝时期,安顺鲍家拳逐步从军事武术演化为民间武术,其社会治理价值主要体现在技击防卫、民族民间交往、健身娱乐这3个方面。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清朝前期贵州地区有过一段相对安定的和平时期,中后期政局逐步动荡、土匪肆虐。彼时,鲍家拳的军事防御价值逐步弱化,而在制止土匪惹事、维护屯堡安定方面的价值逐步凸显。据村中老先生BZQ讲述:“清同治年间,匪患不断,在今平坝区杨官屯村有多人加入匪寇团队肆意横行,为害一方。清朝任命知府毕大锡派官兵清剿该村,杨官屯知名人士到鲍家屯请求鲍家拳头人出面劝诫清军不要牵连无辜百姓,鲍原达因帮助清军剿匪有功,深得毕知府赏识,在鲍原达的再三请求下,清军只抓捕了杨官屯犯法之人,由于鲍原达出面拯救了其他无辜百姓的性命,杨官屯百姓为感激其救命之恩,赠予其《齿德并尊》之匾。”可见,清朝时期,安顺鲍家拳在地方防卫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同时,随着鲍家屯与周边少数民族村寨关系的缓和,相互之间的交流增多,鲍家拳作为一种重要的联系纽带在彼此的交流互动中发挥出重要的功能。据传承人BX口述:“清朝末年,鲍家屯周边有个叫小关口的苗族村落经常受到土匪骚扰,鲍家拳传人破例将鲍家拳的棍术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免受欺凌。”鲍家拳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媒介,使得安顺当地汉苗两族的交流更为紧密,关系更为亲近,彼此间的认同增强。此外,鲍家拳在清朝时期逐步融入到安顺当地的傩戏当中,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在健身娱乐方面发挥出重要价值,起到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促进邻里团结的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土匪猖獗,鲍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在不安定的环境中求得生存,鲍屯人高度重视习武操练,习武人数急骤增多,部分女性也加入了操练行列,逐步形成规模,并组建了相应的护卫队。彼时,鲍家屯借助以鲍家拳为基础组建的独特防御体系多次击退匪寇,维护屯内百姓安全。除此之外,鲍屯人还多次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令方圆数十公里的坏人闻风丧胆,被冠以“拳打脚踢鲍家屯”之说(杨友维,2007),鲍家屯也由此获得了周边村民的赞誉。笔者通过与村中老先生BZQ的交谈得知:“民国时期,旧州场坝逢场期,威宁人赶猪到场上贩卖,旧州六人自恃人多、凌弱逞强,强迫威宁人交钱,由于猪未卖出,威宁人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就殴打威宁人。我们村(鲍家屯)去赶旧州场的人路见不平、伸张正义,用鲍家拳武术将狂妄的旧州六人打败,事后当地百姓为了市场交易安全,提倡由鲍家拳门人来维护市场秩序,每年给予一定的维护费用。”可见,民国时期,安顺鲍家拳的技击防卫功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在国家权力缺位的情况下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阶段,由于习练鲍家拳

的人数逐步增多,鲍家拳蕴含的锄强扶弱、见义勇为、团结邻里、尊重师长等重要价值被逐步广为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鲍屯人及周边村民,鲍家拳的教育价值逐步凸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安顺鲍家屯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嬗变,进而影响到鲍家拳的传承发展。日趋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鲍家拳的技击攻防价值日渐式微,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于鲍家拳的认同减弱,需求降低,鲍家拳的传统社会治理价值日益衰微。但在其自发性的传承过程中,鲍家拳逐步融入了安顺当地的地戏当中,成了人们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

调查发现,每年正月和七月,鲍家屯及周边村落都会进行地戏表演。据村民XYF介绍:“每年正月十七,本村及周边村寨的村民、游客都会过来观看地戏武打表演,那天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安顺地戏表演中包含了大量的武术对打套路,地戏表演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有着较高的要求,这些武术套路多由鲍家拳演化而来。“村里地戏表演队成员大多有鲍家拳武术功底,在运用鲍家拳武术和鲍家拳兵器改造的道具进行对打表演时,不仅我们沉浸在表演当中,观看的人更是赞不绝口、连连叫好。”(访谈资料:BX,鲍家拳传承人)可见,近代以来,鲍家拳主要在愉悦村民身心、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促进邻里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近年来,随着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鲍家拳的社会治理价值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除了原有的消遣娱乐功能外,还在传承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旅游、扩大对外宣传交流、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塑造美丽乡村等方面发挥出重要功能。

综上,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其治理价值的发挥主要取决于各阶段经济社会环境与人们的现实需求,具有历史必然性。伴随着社会变迁,民俗体育的治理价值亦相应地发生着改变,呈现出一定的顺应社会变迁的规律与特征,如明朝时期主要是进行军事防御、清朝时期是为了技击防卫并兼具了民族民间交往功能、民国时期主要是进行个体(族群)的防卫,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则展现出多元化的功能价值。正是由于民俗体育能够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主动进行调适,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主体的现实需求,彰显自身的治理价值,才使其拥有强盛的生命力,保持可持续发展。这构成了其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

3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1 基础前提:找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需要以两者之间的内在相通性为依托,探寻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

的策划设计,确保助力的效果。民俗体育与乡村治理之间存在着诸多内在相通性,包括对和谐有序的追求、对道德贤能的推崇、对团结协作的重视、对秩序规范的强调、对民主自治的倡导等。这些内在相通性使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可能转化为助力的实践,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首先,需要对各类民俗体育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整理归纳出当中重要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汲取一些实用性强、作用明显的价值理念,将之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道德体系当中。其次,要深刻剖析民俗体育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内在机制,籍此创新乡村治理的方式;同时高度重视民俗体育的重要载体作用,通过活动的开展发挥民俗体育在增强社会认同、促进村民团结协作、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功能。再次,还需对民俗体育活动中的各类秩序规范进行严格甄别,根据当前乡村治理制度规范建设的要求,将合理的、有效的制度规范纳入到当前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当中,不断完善现有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增强其针对性和适用性。最后,还需探寻民俗体育活动的组织开展方式与当前乡村治理提倡的自治方式之间的内在相关性,深入解析民俗体育活动自发性组织形式得以产生的条件、内在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乡村自治的方式,增强乡村自治的效果。

3.2 政策维度:加强政策支持与制度配套

政府在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从总体上负责统筹协调和资源调配。当前,国家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度安排为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指引,但当中并未涉及过多的具体实践操作内容。因此,需要基层政府部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制定配套的制度条例,细化各种实施细则。作为我国基础的政权组织,基层政府既是国家政策制度的执行主体,又是地方制度条例的设计主体,同时还是各类实践活动的监管主体(袁金辉等,2018),在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前,需要基层政府更好地领悟国家文件精神,务实高效地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为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提供宽松的政策制度环境及必要的支持,做好相应的引导与监督,营造良好的氛围。具体包括:1)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下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措施,如“通过民俗体育活动实施社会治理的意见与办法”“民俗体育活动中融入治理元素的实施办法”“民俗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的监管措施”等;2)通过经费划拨、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各类合法合规的民俗体育活动予以支持;3)加大对民俗体育自治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力度,发挥民俗体育自治组织的中介桥梁作用;4)对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确保各类活动合法合规,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效果。

3.3 组织维度:健全民俗体育村落自治组织

民俗体育自治组织具有灵活性、亲民性和机动性等特征,可以成为联结村民与乡村、村民与政府的重要桥梁。由于民俗体育自治组织大多基于村民的认同与支持得以自发形成,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拥有一定的内生权威,能够发挥出较好的动员、组织与整合作用。因此,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应当高度重视民俗体育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转型加速,价值观念快速变迁,民俗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组织机制受到严重阻滞,各类自发性组织发展日渐式微。新时期,要想进一步发挥民俗体育对乡村治理的助力作用,需要加强各类民俗体育组织的建设。首先,要加强组织内部建设。民俗体育组织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内部能人匮乏,各类制度章程缺失,因此,可以从内部人员建设和制度章程建设两方面着手。在人员建设方面,既要加强各类民俗体育传承人的培养,提升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又要吸纳部分组织管理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乡贤进入民俗体育自治组织。在制度章程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组织内部的制度规范,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营造良好的内部制度环境(刘转青等,2018)。其次,要加强政府对民俗体育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政府要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组织优势,通过政策优待、财政补贴、购买服务和项目委托等多种形式,为民俗体育组织发展注入资金,破解资金难题(孙玉娟等,2021),同时,要帮助民俗体育组织加强内部建设,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最后,要加强与民俗体育组织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保障其合法的社会治理地位,规范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与方式,确保其按照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要求有序运行。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社会认同,夯实民俗体育组织建设的群众基础。

3.4 思想维度:形成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认同

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新时期,国家多次强调要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促进传统文化复兴。因此,亟待重新审视我国民俗体育的时代价值,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在此基础上扩大民俗体育的社会影响力,为助力乡村治理奠定基础。文化认同需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只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去反思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对其作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继续保存,不足之处予以加强,欠缺之处加以改进(刘转青等,2011),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了解民俗体育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诚如朱高正(2004)所言:“我们若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文化创造的整体,则民族与个体之间有许多地方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相当于一个人人格的觉醒。一个民族将回顾过去对整个民族有意义的事件或决定,进而予以‘反

省’,并对此‘反省’再予以‘反省’,从而产生民族的自觉。”对整个民族而言,“过去”是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现在”是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于关键时刻所做的决定;“未来”则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理想目标。一个民族必须能够清楚地判别过去的光荣、耻辱,知道有过什么重大的成就或严重的缺失,才能以此作为基础,正确地做出决定,合理地规划全民族未来的发展。一个民族能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创造传统,就是文化主体意识的凸显(朱高正,2004)。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重塑文化主体意识,自觉主动地对包括民俗体育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反思,在此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进而扩大民俗体育的社会影响力,为其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5 认知维度:以民俗体育活动为纽带唤起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

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在于形成乡村共识(钟秉枢等,2019),而乡村共识形成的内在基础在于情感共鸣(张振华,2014)。乡村社会情感共鸣的产生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需要以乡村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情感经验为依托,需要反复的唤醒与强化。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变得日趋频繁,乡村社会内部的异质性大大增强(王世军,2022),人们逐步进入一种个体化、原子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生活模式。各种价值观念带来的冲突正在猛烈冲击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趋瓦解,人际关系范式被快速重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被稀释,信任程度降低,依赖性减弱,人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乡村社会赖以维系发展的情感纽带出现了裂缝,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社会整合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亟待寻绎弥合乡村社会情感裂缝、巩固乡村社会情感关系的联系纽带,以联系纽带为桥梁,不断唤醒村民之间的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协助解决乡村社会亲情缺失、乡村文化式微、乡村治理体系失序等问题,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果(孙文波等,2021)。作为源起于村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民俗体育,其天然的亲民性、内在的包容性、广泛的群众性、厚实的基础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作为联结村民的纽带,不断唤醒和强化村民之间的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诚如前文所述,民俗体育活动的组织可以塑造一种特定的场域空间,在该空间中,人们可以拥有超脱于世俗功利逻辑的互动关系,自由地展演自身的文化、身份和诉求(卢衍衡等,2019),获取他人的认同,最终实现内在的和谐统一。可见,民俗体育活动不仅塑造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秩序,赋予和表达了民间意识形态的结构特征和意识特征,甚至可能塑造出一种乡村民间文化性格,从而

唤醒乡村社会情感共鸣,形成广泛的乡村共识。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民俗体育活动的联系纽带和桥梁作用,不断唤醒村民的乡村社会情感共鸣,形成广泛的乡村共识,推动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3.6 技术维度:塑造典范,注重以点带面

我国民俗体育种类繁多,功能价值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在引入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区别对待,重点明确,优先将一些社会治理价值突出、国家重点保护发展的民俗体育项目引入到社会治理场域当中,有意识地将其塑造成助力乡村治理的典范,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全面实现民俗体育对乡村治理的助力作用。譬如,舞龙舞狮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项目,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舞龙舞狮最初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祈求甘雨、驱邪消灾的仪式得以诞生,其间蕴含着人们对实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驱凶纳吉、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和愿望(焦英奇等,2014)。传统农耕社会,舞龙舞狮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族群认同和对社会秩序强化的作用,发挥出重要的社会治理价值。在后期发展过程中,舞龙舞狮逐步演化为民间娱乐活动,成了各种庆典礼仪的重要展演内容,象征着吉祥与好运,其间凝聚着追求和谐、幸福、安宁、吉祥的价值旨趣,是对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其功能价值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袁丽等,2017),但其在促进社会交往、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凝聚力、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社会治理价值仍非常突出。基于舞龙舞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多元的社会价值,国家高度重视舞龙舞狮的传承与发展,将其视为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赋予其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可以有意识地将舞龙舞狮塑造成助力乡村治理的典范,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作用。具体可以将龙狮节庆活动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借助龙狮节庆活动平台宣传推广乡村治理的政策措施;在龙狮节庆活动中融入一些乡风文明建设内容;或在一些重要的乡村治理活动中融入龙狮展演环节,更好地营造氛围、活跃气氛、增强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舞龙舞狮运动对乡村治理的助力作用。此外,可以通过电视、报刊、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典范的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全面实现民俗体育对乡村治理的助力作用。

4 结语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之基石,探寻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果,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亦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得益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涌现出一批好的经验和做法。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乡土地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乡村社会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场域。该场域拥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则和实践逻辑,并由此影响行动者的实践行为和最终治理效果。正是由于乡村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乡村治理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权力运转除了遵循国家逻辑之外,还呈现出“乡土性”运行逻辑(杨嵘均,2010),单纯依靠国家顶格治理并不能完全满足乡村治理多元化、个体化、差异化需求。创新乡村治理模式,采用整体化、多元化、复合化的治理运行机制成为了共识(李长健等,2019)。就本质而言,我国乡村仍属于熟人社会、礼俗社会,孕育于乡土社会、蕴藏于村民内心的传统文化因子仍在悄然发生作用。“以民为本”“礼用之,和为贵”等社会治理理念明晰了乡村治理的着力点,其核心在于动员而非强制,其内在机理源自于集体共同文化价值认知构成的行动网络。揭开理性遮蔽,运行文化符码,打破结构性掣肘,因势利导地将传统文化因子融入乡村治理框架当中,是乡村治理高质量的内在要求。

民俗体育根植于乡土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天然的亲民性、内在的包容性、广泛的群众性、厚实的基础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可以作为联结村民的纽带,成为乡村社会互动互融的重要桥梁,在唤醒村民情感共鸣、形成乡村共识、激活乡村内在治理动力、填补基层“管理真空”、化解二元化结构矛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卷之四氏族志)[M].安顺: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
- 焦英奇,刘良超,2014.民族图腾与国家象征:龙狮运动的文化价值与仪式认同[J].体育与科学,35(1):104-107.
- 李长健,李曦,2019.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1):78-84.
- 刘转青,郭军,刘海军,2011.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反思与重构[J].体育成人教育学报,27(5):11-13.
- 刘转青,殷治国,郭军,等,2018.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缺失的场域理论解析[J].体育学刊,25(4):14-20.
- 卢衍衡,钱俊希,2019.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J].地理研究,38(7):1609-1624.
- 孙文波,叶世俊,2021.互动仪式链视域下民俗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基于E市Z村的田野调查[J].体育成人教育学报,37(1):59-63.
- 孙玉娟,孙浩然,2021.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掣肘因素与行动逻辑[J].行政论坛,28(5):37-43.
- 万义,李珂,2022.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境、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8(5):21-26.
- 王世军,2022.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43(7):215,242.
- 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译.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6.
- 吴莲花, 2022. 边界与融合: 关刀文武灯阵仪式体育参与者的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48(4):71-76.
- 夏建超, 2023.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顺鲍家拳的治理价值变迁研究[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40.
- 辛鸣, 2014. 伟大复兴中的“精神独立性”: 中华文化的“讲清楚”与“发扬好”[J]. 人民论坛(16):44-48.
- 杨俊一, 张森年, 2015. 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304.
- 杨嵘均, 2010.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J]. 江苏社会科学(6):122-128.
- 杨友维, 2007. 大明屯堡第一屯: 鲍家屯[M]. 成都: 巴蜀书社:69.
- 袁金辉, 乔彦斌, 2018. 自治到共治: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 行政论坛, 25(6):19-25.
- 袁丽, 万里, 苏雯等, 2017. 龙狮运动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价值研究[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5(3):15-16.
- 袁佩媛, 靳玉军, 2023. 沉浸式赋能: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2-61.
- 张静, 202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认同的逻辑构成和实践路径研究[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4(1):68-72.
- 张振华, 2014. 当代中国社会共识形成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67.
- 赵超, 青觉, 2018. 象征的再生产: 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6):103-109.
- 钟秉枢, 张建会, 刘兰, 2019. 用体育的力量, 推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来自广西乡村振兴的体育实践[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42(3):21-31.
- 朱高正, 2004. 中国文化与中国未来[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 76.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Folk Sports in Facilit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LIU Zhuanqing¹, HE Qiling², XIA Jianchao³, PAN Jiangjie⁴

1. Sports Institute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2.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25, China;

3. Changde City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Changde 415000, China;

4. Guanling Autonomous County Ethnic High School, Anshun 561399, China

Abstract: The search for effective models and paths for rural governance is crucial in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role of folk sports in facilitating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and explores practical path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folk sports contribute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fostering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y also help in refin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ng sports and tourism,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dditionally, folk spor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building a strong spiritual cor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lk sports have a long historical origin in facilitat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governance value primarily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eople. To leverage this potential,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areas of convergence,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establish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for folk sports in villages, promote cultural self-awareness and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cus on creating exemplary models that can have a broader impact. By using folk sports activities as a means to evoke emotional resonance, a sense of rural consensus can be formed.

Keywords: folk sports; rural governanc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path